

女子被害身份成谜

检察官借寻亲节目锁定真凶



被害人亲属
送锦旗感谢检方,
冥一为聂广来

18年前,两名外地女子来南京找工作,被人杀害后抛尸荒野。多年后,警方运用DNA等技术梳理陈年命案,发现嫌犯杜某。但嫌疑人到案后,由于无法确认死者身份,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锁链,不符合起诉标准。难道眼睁睁看着凶手逍遥法外?凶手最终是如何伏法的。1月17日上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办案检察官聂广来向记者披露了案件始末。

●18年前的罪恶

饭店老板起色心,酒后强奸杀人抛尸

1999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四),被害人姜某(女,时年37岁)带着外甥女翟某(女,时年17岁)从安徽芜湖到南京中华门扫帚巷劳务市场找工作。而当时在江宁开饭店的杜某因店里缺人手来寻找菜工,找到了姜某,应姜某要求捎带外甥女同去店里帮忙。

到了饭店,杜某拿出过年剩菜招待姜某和翟某吃饭。席间杜某喝了点酒,动了色心,便支开姜某去买菜,乘机强奸了17岁的翟某。哪知这一幕被很快回来的姜某看到,杜某慌了,顺手拿了一把羊角锤猛击姜某头部。翟某一看舅妈倒在血泊中,吓得尖叫。杜某又以手臂扼住翟某的脖子,直到她没了气息。

翟某和姜某死亡后,杜某借了辆车,将两具尸体分别抛在江宁和栖霞的一处公路旁。为防止血滴下来,在运尸前,杜某分别用塑料袋裹住了两尸头部。

据检方透露,南京警方是在浦口的一处公交车站将杜某抓获归案的。刚到案时,杜某并不承认自己杀人的事实,直到第6次审讯才慢慢供认。直到归案,杜某也说不

清二人来历,只知道女孩说的是普通话,而姜某的口音则是安徽或苏北一带。

●尴尬的局面

嫌犯抓到了,却因证据不足无法起诉

据检察官聂广来透露,1999年正月初五一早,先后接到群众报警,两具女尸被发现。警方认为凶手可能为同一人,该案被并案侦查。警方发现其中一名年轻死者生前有被强奸过的痕迹。然而,由于遗留线索太少,两名死者的身份无法确定,此案一直悬而未破。

直到2015年1月,警方运用DNA技术清理全市陈年命案时发现,年轻死者体内的一份DNA样片与本市一杜姓男子相吻合。随后,杜某被抓。

可是,该案在移送检察院时,检方却发现,死者身份成谜,作案工具也找不到。为寻找相关证据,公安机关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方式进行了大量侦查取证工作,但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聂广来说,这类刑事案件,被害人身份、作案工具及原始案发现场都是极其重要的证据。可该案中,这三项证据无一具备。也就是说,嫌犯杜某一旦翻供,将没有其它证据加以佐证,执法部门会陷入

被动。

聂广来说,虽然17岁的被害人翟某体内的DNA样片与杜某的DNA相吻合,但这一证据并不能判定杜某对死者实施了强奸还是自愿性行为。

而所谓的“案发第一现场”,如今已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门面,而且该门面几易其主,经多次装修,早已“物非人非”。

因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南京检方检委会经研究认为,此案因证据存疑不符合起诉标准。

●检察官的决心

借助央视寻亲栏目,终于锁定凶手

“别瞎折腾了,宁可放纵,也不能错杀。”面对一些劝说者,“认死理”的检察官聂广来不为所动,两人被杀是事实,DNA样片也直指杜某,若不起诉,难不成让凶手逍遥法外?而死者又如何安息?他决定,从寻找两名死者的身份下手,那段时间他特别关注失踪人口的相关报道,中央电视台有个《等着我》栏目,很多失踪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人都能通过节目找到亲人,他也决定试一试。

去年3月下旬,聂广来与南京警方刑侦办案人员带着两名死者的DNA数据到公安部,找到打拐办副巡视员陈世渠,请求帮助联系《等着我》栏目。通过对后台技术支持公司登记的20万失踪人口展开模糊检索,从460条疑似线索中终于成功发现一条有价值线索:翟某于1999年2月15日左右随舅母去南京打工,后来失去联系。

聂广来立即联系了翟某的哥哥,得知其舅母也失踪了。

因为情况基本吻合,当天,公安机关就派人到安徽芜湖进行了采血,最终确认两名死者正是歿年37岁的姜某及歿年17岁的翟某。

由于确认了死者身份,且存有5份血迹检验报告书,分别交代清楚了重要作案工具之一的塑料袋内外的血迹DNA数据,证明了嫌

犯在扼住女孩颈部的时候,女孩嘴角流血,在塑料袋内侧留下血迹,而塑料袋外侧的血迹经检验正是女孩舅妈姜某的。由此可以判定,嫌犯先杀害了姜某,之后又杀害了翟某,在用塑料袋包裹翟某头部的时候,沾染了姜某身上的血。

至此,与嫌犯杜某的供述串起吻合完整的证据链。检方还提出,因为当年的血迹没有DNA数据,应当对被害人的短裤进行DNA检验。最后,法医中心特地补充了两份重要的鉴定意见。

去年5月31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将杜某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月10日,南京中院已对此案作出宣判,杜某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被告人、被害人家属均没有上诉。

第二天上午,被害人姜某的儿子专门到检察院送上锦旗,激动地说:“我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而聂广来说,这句话也是他现在最想说的。

延伸阅读

是否所有的命案都需查证被害人身份?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黄志坚告诉记者,查实验证具体被害人身份的作用和目的,在于弄清案情中最重要的细节——被害人是怎么死的?一是避免被害人家属心中悬案存疑,二是案件本身证据链闭合完整的需要,解决所有的疑问,让案子成为铁案。当然也有个别特定的情况,比如流浪汉一时无法查证核实其身份,但其他各项证据形成完整的指证链证明嫌犯犯案。黄志坚强调,在人们传统印象中,公诉检察官的职能只是做书面卷宗的“文人”,其实还有引导公安机关侦查、指导办案、监督其执法合法性,包括排除对嫌犯进行刑讯逼供以及监督审查法院量刑刑讯逼供的情况,尽可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据《扬子晚报》

连载



将原来所称的“继代代销店”更名为“太平商店”,由黎慧智全面负责,继续保留黄志恩担任太平商店营业员。

在将“继代代销店”更名为“太平商店”的同时,高坪供销社还做出了另一项决定,撤销原来分设在白沙、安民和后庄的三个代销店。从三个代销店精简下来的人员,凡是1957年年底以前进入供销社的,由供销社另行安排工作。凡是1958年以后进入供销社的新职工,一律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然而黎慧真就没有黄志恩这么幸运了。

三层岩煤厂是1958年中期新上马的采矿企业。由于资金缺口

大,机器设备紧缺等原因,煤矿自从开工建设以来,一直还没有正式投产。鉴于国家当时的经济形势,继续大量投入资金已经很不现实,因此,遵义县决定将其暂时下马,关闭两年至三年,待国家和县里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后,重新恢复煤矿开采。凡是在本次关闭期间被精简的人员,到期享有优先录用权。于是,黎慧真背着铺盖卷,又回到了大哥黎慧智的家,继续到狮虎队参加农业生产。

自从太平商店的规模扩大,白沙、安民和后庄三个代销店撤销以后,黎慧智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基本上是原来四个代销店的工作任务,全加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由于太平商店的覆盖面更宽、更广,任务量更大,无论是收购的土特产品还是商品的销售量,以及需要进山送货的品种和频率,都比原来大大地增加了。加之随着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的不断普及和推广,黎慧智除了还是依旧隔三岔五地挑着一担去高坪,又从高坪挑着一担回太平外,进山给居住偏远老百姓送货的品种和次数也就更多、更频繁了。

在这种情况下,黎慧智才安排一些自己实在承担不完的运输任务,按照供销社的规定,以每市斤一分钱的运价,给被下放回来的弟弟黎慧真,以及吴光符、杨峰琰和儿子黎兴载等承担一些。但是,隔三岔五的送货下乡,因为牵

涉到商品经营行为,不是简单地将货物从甲地挑运到乙地,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非得要他亲自进行不可。

黎慧智送货下乡直接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其中最使他感动的是,每当居住在深山老沟里的老乡们老远看到或听到他挑着担子来了,就会立马跑出来,帮他担到他要去的地方。有时候还会你帮挑一段,他帮挑一段地接力运送;也有时候是老人们在院坝老远看见黎慧智挑着担子上来了,便马上喊自己的子女们:

“你看,你看,那刚刚拐过山湾的挑担人,好像是太平商店的老黎又给我们老百姓送货来了,快去帮他接一肩。”

于是,子女们便会放下手里的活儿,飞快地跑去接过黎慧智肩上的担子,帮他挑到他要去的地方。

好在严冬终于过去,原本就美丽静谧的山乡云散天青,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人们终于熬过了血雨腥风肆虐最为猛烈的艰难日子。

还是在大办食堂期间,尽管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每人每月仅有的十几斤定量粮,仅够一家人吃半个月,加之拖着一大窝孩子,稍微精细一点的食物,又不得不尽量节省下来给孩子们吃,黎慧智不但还是要完成他那异常繁重的每天一挑的体力活,而且他的工作态度依旧毫不懈怠,工作内容也有增无减。

他每天将太平收来的土杂物资挑到高坪,再将该从高坪调回销售的货物担到太平。

1961年开春以后,尽管人们的生活还是非常艰难,腰带仍然需要勒得紧紧的,一些人由于饥饿而柱上的棍子,也许还暂时离不开,丢不了。但是,毕竟春风已经吹进了山乡,距离开花结果的日子已经有指望了。

初春的一个下午,黎慧智肩上挑着近百斤重的一挑煤油正从高坪往太平赶。眼看着天色不早,他步履比平常间加快了許多。终于上到伍家堰口了,他想到离家不远,下完坡就可以到家,反正已经不至于摸黑到家了,于是放下挑子,在时常歇脚的大石块上坐下来,打休息一会儿,顺便把离开高坪时,供销社秘书递给他的,从河南老家寄来的一封信看一看。

这是河南老家的三弟慧平代表姐姐慧成他们两家人写来的信。自从黎慧智一家定居太平后,他便在信中交代三弟慧平,今后写信来,都直接寄到高坪供销社,转黎慧智收。因为他最多隔一天,就要往返高坪一趟,直接把信寄到供销社,既快,又不容易丢失。

一阵微微的山风吹来,早已是汗水浸透全身的黎慧智觉得一阵清凉惬意。他感到,弟弟慧平以往写来的信,一摸就知道是薄薄一张纸,而今天这封信似乎要厚实些,至少也有两到三张纸。他一边掂

量,猜想着弟弟的这封信写这么多,会是些什么内容,一边回忆自从他离开河南,独自要着饭来到遵义的这几年,与老家,主要是与三弟的联系情况。

黎慧智来到高坪就一病不起,被黄志恩送进专区医院住院及其前后将近一年的情况,他并没有写信告诉家里。给父亲写的第一封信是他从专区医院出院,看到报纸报道南阳地区遭受特大水灾的消息后,担心父亲和儿子兴月难以躲过这一劫,于是才写了信,要父亲和三弟慧真一起,设法带着兴月到贵州来。第二封信是父亲、二弟慧真和儿子兴月到高坪的第二天寄出去的,目的是尽快向家里报个平安,好在父亲的三姊妹放心。第三封信是父亲去世后,就赶着尽快给河南去信,述说了父亲来到高坪不久就生病以及最后不治逝世的有关情况。第四封信是黎慧智一家胸前挂着大红花,被喧天的锣鼓声送到太平以后没几天就写的,是忙着向家里通报地址变动和工作安排等情况。第五封信自然是告诉在家的姊妹们,黎慧真被招收到遵义县三层岩煤厂工作的信息。

他每次给老家去信,都是寄到前赵村,要嘛写给姐夫王耀堂收,要嘛写给弟弟黎慧平收,反正每一封信都是以他和二弟慧真的口吻写给包括范楼村八姊妹,他们三家一起的。(161)